

考试新论

以科举和高考为中心

冯用军 朱华山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
21世纪高等学校通识教育读本
全国考试科学『十二五』推荐教材

考试新论

以科举和高考为中心

冯用军 朱华山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21世纪高等学校通识教育读本
全国考试科学『十二五』推荐教材

© 冯用军 朱华山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考试新论：以科举和高考为中心 / 冯用军，朱华山
著.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2. 2
ISBN 978-7-205-07084-7

I. ①考… II. ①冯… ②朱… III. ①高考—研究—
中国 IV. ①G632.4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85792 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110003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辽宁彩色图文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70mm×240mm

印 张：27

插 页：1

字 数：348 千字

出版时间：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赵学良 成咏梅

封面设计：杜 江

版式设计：王珏菲

责任校对：王 静 等

书 号：ISBN 978-7-205-07084-7

定 价：46.00 元

法律顾问：陈光 咨询电话：13940289230

内容简介

科举有“现代高考”之名，高考有“古代科举”之实。科举与高考，文脉相连、千古一叹，美美与共、和而不同。本研究穿越科举贯通高考、扎根西部放眼全国、聚焦现实展望未来，以我国古代科举丰富历史实践与运行规律为“经”，以我国高考等现代考试的复杂改革与发展实际为“纬”，横向爬梳、纵向拓展，致力于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遵循“鉴古知今、博今通古、以史为据、论从史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研究原则，从跨学科视角对我国古今处于社会文化轴心地位的国家抡才大典——科举、高考等进行全方位系统审视，从多学科视野深入探讨科举现象所隐喻的文化特质及其全球价值，运用从“定性到定量的综合集成法”充分挖掘千年科举运行的经验教训对高考等现代考试的价值，并进而探索落实公平与效率兼顾的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大类招生、多元录取的高考新机制，提出新课改背景下统一高考和自主招考等统合的改革新思路，推进新高考等国家大考为多样性人才培养服务的发展新举措。本书可作为21世纪高校通识教育读本，也可以作为教育史、高等教育史、教育学、高等教育学专业及科举学、考试学、评价学、评论学和评估学方向研究生教学用书或科研工作者参考用书。本书对教育、历史、社会、政治、法学、文化、评价、经济、管理、人力资源、科学学等学科领域的决策者和爱好者也有一定启示。

序

冯用军、朱华山两位博士最近寄来新作《考试新论——以科举和高考为中心》，请我为之作序。我觉得以科举和高考作为研究的选题，符合当今教育改革的需求和时代发展的趋势，遂应允下来，写了这篇小序。

考试是甄别人才、选拔人才、以考促学的主要手段，也是维护社会公平、保障社会稳定、促进人才流动的重要渠道。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也是考试的发源地。由于考试有助于统治者扩大统治基础、选拔优秀人才、维护政治统治、稳定社会秩序、促进民族融合，因而中国古代统治者很早就发明了考试。

中国最早的考试可追溯到尧舜禹时期。为了选贤举能，“尧试舜”，“舜试禹”，开启了中国考选历史的先河。而正式的制度化考选始于西汉，“西汉文帝前元十年（公元前165年）举行的贤良方正科考试，既是我国不定期举行的特科考试的开端，又是我国取士考

试的开端”^①，从此产生了察举孝廉、选贤良方正的人才选拔制度。

我国的古代考选制度大致可分为贡举制与科举制。所谓贡举就是地方向中央荐举人才，再经一定的考试来确认是否合格的一种制度，西汉的察举制就是贡举制。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沿袭察举，后推行九品中正制，实行荐举与考试结合的贡举法。

科举考试诞生于隋朝，不看考生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地位，任何人都可参加，坚持“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的宗旨，力求公平，注重程序，企图以此囊括天下有才华之士，为统治者所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隋朝沿袭自东汉开始、传统的按地区和人口定名额的做法，实行解额制，即规定各地准许参加科考的人数。隋文帝就规定每州岁贡3人，加以考试，及高第者为秀才。唐高祖时期，仍然实行按州人口多少进行乡贡，大州岁贡3人，中州2人，小州1人。同时还规定应考者“皆须于本籍报名”^②。这样既有效地兼顾了地区之间的平衡，又防止了考试移民。北宋时，由于北方久经战乱，经济萧条，教育大大落后于南方，结果出现南北举额严重不均的现象，尽管实行各地定额报考制，但进士及第者大多数在京城开封府和南方，而广大北方与边陲地区额很少。此种情况甚至引发了一场在司马光与欧阳修两位朝中大臣之间发生的有名的科举南北之争。明朝统治者力图解决这一矛盾，由于在科举考试中竞争最激烈的就是乡试，因此实行乡试中举分省定额制。清朝在沿袭明朝的乡试分省配额制的同时，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又进一步完善了录取制度。较明代更为具体，在确定各省举额时，综合考虑该省的人口总数、考生总数、贡赋情况、教育发达程度以及边疆少数民族等多种因素。

① 盛奇秀. 中国古代考试制度 [M]. 济南: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88.

② 《唐会要·缘举杂录》，转引自：杨学为等主编. 中国考试制度史资料选编 [M]. 合肥: 黄山书社, 1992: 72. 或：刘海峰. 科举制与“科举学” [M]. 贵阳: 贵州教育出版社, 2004: 138.

科举制以其相对的制度优越、方法公平、程序公正而得到世人的认可和社会的拥护。正像费正清（本书作者注：约翰·金·费尔班克（John King Fairbank），1907—1991年，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所言：“在一个我们看来特别注重私人关系的社会里，中国的科举考试却是惊人的大公无私。”^①“科举曾经是一种优越的制度，它在1000多年时间的实践中逐步趋于完善。”^②然而“法久终弊”，在长达1300年的运作过程中，科举制逐步走向刻板僵化和形式主义，最终在西学浪潮冲击之下和开明国人的抨击声中，于1905年走向解体。

中国现代高考制度是在长达数千年的本土考试发展历程中逐步演变而成的，既吸收了现代考试制度的科学内容，又不可避免地被烙上了中国古代科举的消极印痕，积极作用与消极影响并存。由于某些现实因素的作用，其不足和问题暴露得更为明显，也导致目前社会各界对高考制度严重不满，改革重建的呼声近年一直不绝于耳。

正是基于“以史为鉴，改革考试”的目的，冯用军、朱华山两位博士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经过自己的艰辛探索，撰写了这部颇有新意的《考试新论——以科举和高考为中心》。作者立足科举反思高考，聚焦现实展望未来，以我国古代科举丰富历史经验与运行实践为“经”，以我国现代高考等现代考试的复杂改革与发展实际为“纬”，横向爬梳、纵向拓展，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遵循“鉴古知今、博今通古、以史为据、论从史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研究原则，从跨学科视角对我国古今处于社会文化轴心地位的国家抡才大典——科举、高考，进行全方位系统审视，从多学科视野深入探讨科举现象所隐喻的文化特质及其现代价值，充分挖掘千年科举运行的经验教训对

① 费正清. 美国与中国 [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71：41.

② 费正清. 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437.

高考等现代考试“存废之争”、“改革之争”的启示，并进而探索高中新课改、自主招生联盟和综合评价多元录取进程中我国新高考等国家级大规模考试的未来改革走向问题，对新一轮高考改革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全书重点突出，主线清晰，观点鲜明，材料丰富，文字流畅，富有可读性。

可能是由于自己近年来一直比较关注高考改革，对之作过一些调研和建议，并曾在湖北省和武汉市教育行政部门分管过这方面工作，我对书中论及高考改革的部分尤感兴趣，窃以为这可能是作者书中最具创见的部分。作者提出的一系列新判断、新观点，尤其是高考改革的十八大关系、高考改革的四个关键性瓶颈、建立科学的综合性考试评价体系、以通识教育打破招生专业壁垒等见解和主张，可以说是切中肯綮，富有现实针对性，比较切实可行，体现了两位作者“求真务实”的研究取向和思想作风。这也是我所一贯欣赏和倡导的。

我始终认为，教育理论工作者因其素养与工作之故，对于高考改革之类教育热点问题的看法，常常要较社会一般民众更为理性、客观，负有对之研究和建言的责任与义务。那些教育热点问题出现之后，往往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如果不能形成对它们的全面、科学认识，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不能提出学者的建言，问题得不到及时有效的解决，就容易酿成社会事端，给教育事业的发展造成损害，乃至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的学者，尤其是教育理论工作者，要关注教育热点问题，主动研究教育热点问题。通过研究和分析，以消除人们对教育热点问题的一些误解，进而引导社会大众正确地理解教育，形成对教育的科学认识。

研究教育问题，教育理论工作者自身首先应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与立场。我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工作20多年，近十年来又在教育行政部门和人大立法部门供职，并担任多个教育研究机构和咨询组织的

成员，深感许多教育问题，成因复杂，积重已久，政府有关部门和人员并非毫无察觉或认识，也不是不想解决，而是一时找不到很好的解决办法，或还须等待解决的最佳时机，需要社会上和学术界提出良策高招，促成解决。因此，一味埋怨、指责，于事毫无助益。知识分子当然应对社会始终抱有清醒的头脑和批判的意识，但更重要的是，应有一种建设的态度，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提出切实可行的改进措施，把国家、民族的利益始终摆在个人的名利之上，展现出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我一直坚信，“民众的立场，建设的态度，专业的视野”才应是我们每个学者，尤其是教育理论工作者所秉持的基本准则。这里所谓“民众的立场”，是指以人民群众特别是人民群众中的弱势群体的利益而不是以政府或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为对待和处理问题的出发点；所谓“建设的态度”，是指以合作的姿态、合适的方式提出解决问题的积极办法与措施，而不是以对立的姿态、生硬的方式要求政府必须马上做什么，否则政府就是“失职”、“渎职”；所谓“专业的视野”，是指分析问题或提出对策，都要以专业的知识与理论为背景，以深入调查研究得来的大量的事实和资料为依据，而不是道听途说，乱开药方，动辄以“专家”自居，误导社会与民众，猎取虚假浮名。

今天的中国，发展与改革的任务空前繁重，学者特别是教育理论工作者的责任也空前重大。对待教育难题，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渐进的改良（“费边式”战略），一种是激进的革命。激进的革命固然快捷彻底，但代价太大，成本过高，而且往往留有严重的后遗症。渐进的改良，尽管推进速度缓慢，但稳中求进，代价较小，成本较低，后遗症小。在一个和平建设的年代，知识分子最好是通过渐进的改良以达至社会改造之目的。那种“废除高考”之类的极端看法和建言，除了徒具发泄个人对高考制度弊端不满情绪的作用，完全没有现实可行性

和可操作性。在人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比高考制度更加科学合理的制度之前，我们对于高考制度只能是逐步改革和完善。换句话说，在高考制度改革问题上，追求改革方案在无约束条件下的“帕累托最优”是没有太大实际意义的，现实可行的是努力做到“帕累托次优”，即在有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

用军和华山两位作者今后的学术生涯还长远得很，相信两位作者会以这部《考试新论——以科举和高考为中心》作为新的研究起点，在今后的学术道路上，取得更大更好的成绩，为社会贡献出更多的才华。懿欤休哉，有厚望焉。

周洪宇

2011年4月20日

于武昌桂子山

（序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江教育研究院院长；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副会长）

目录

序 / 周洪宇

引 论 借鉴科举智慧 推进高考改革 / 1

第一章 立学与正名 千年科举评价与启示 / 13

第一节 科举无愧中国“一大发明” / 18

第二节 科举制度的历史演化与影响 / 27

第三节 科举制度被一朝遽废的根由 / 51

第四节 科举制度的历史教训与经验 / 59

第二章 冲突与一致 科举制度的政治功能 / 80

第一节 科举制度的政治性功能概要 / 81

第二节 科举制度控制社会冲突功能 / 82

第三节 科举考试促进社会一致性 / 91

第三章 分层与流动 科举制度的社会功能 / 100

第一节 科举制度的社会分层功能 / 101

第二节 科举考试的社会流动功能 / 112

第三节 科举考试促进个体社会化 / 121

第四章 传承与创新 科举制度的文化功能 / 129

第一节 科举文化与社会互动分析 / 131

第二节 科举考试与古代中国文化 / 140

第三节 高考与现代中国文化创新 / 149

第五章 惩恶与扬善 科举律制与考试立法 / 157

第一节 科举时代的考试立法回溯 / 161

第二节 科举立法与中国高考立法 / 168

第三节 中国考试立法问题与建议 / 175

第六章 重建与共生 恢复高考的战略影响 / 180

第一节 邓小平恢复高考的战略决策 / 181

第二节 恢复高考的战略影响与价值 / 184

第三节 当代高考改革的新走向反思 / 187

第七章 保守与变革 高考改革的利益分析 / 193

第一节 高考改革利益方关联模型 / 194

第二节 高考改革倾向的抽样调查 / 196

第三节 云南高考改革调查的解读 / 197

第四节 高考改革的系统优化调控 / 204

第八章 瓶颈与出路 高考改革的科学思维 / 208

第一节 高考改革的关键性瓶颈 / 209

第二节 高考改革的转向是评价 / 215

第三节 高考改革的纲要性指南 / 221

第九章 公平与效率 云南省高考改革述论 / 225

第一节 云南高考改革的独特历程 / 226

第二节 云南高考改革的新进展 / 233

第三节 云南高考改革的现代反思 / 235

第十章 分化与融通 西部高考整合新方案 / 239

第一节 高校考试招生的基本内核 / 239

第二节 西部高考整合改革的思路 / 242

第三节 西部高考的整合对策方案 / 245

第十一章 一体与多元 和谐时代的高考改革 / 258

第一节 高考改革的十八大关系 / 259

第二节 新阶段高考改革新预期 / 275

第三节 综合性评价与多元录取 / 276

第十二章 实体与虚拟 互联网上的教育考试 / 285

第一节 现代教育考试管理与服务 / 286

第二节 互联网平台上的考招体系 / 288

第三节 网上教育考试的技术实现 / 293

第十三章 统招与自主 高考与创新人才选拔 / 297

第一节 统招与自主招生的历程 / 298

第二节 自主招考的历史性贡献 / 320

第三节 大类招生与通识性教育 / 326

第四节 高考破格录取大师案例 / 335

第十四章 困境与出口 中国考试研究的忧思 / 342

第一节 关注中国考试研究的动因 / 344

第二节 中国考试研究的主要困境 / 347

第三节 中国考试研究的合理出路 / 362

第四节 基于危机的考试研究展望 / 368

第十五章 热点与焦距 高考志愿的叙事研究 / 370

第一节 高校考试招生的新变化 / 371

第二节 阳光高考从理想到现实 / 374

第三节 高考志愿选择的理智性 / 377

余 论 通识教育打破招生专业壁垒 / 388

主要参考文献 / 395

后 记 / 410

引 论

借鉴科举智慧 推进高考改革

科举制度是一种科学制度，其本身是中国古代极具智慧的文武官员选拔制度、极优设计的中华传统文化承扬制度。以科举制度为独特研究对象的新科举学是一门科学，一门研究千年科举运行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科举制度是一种文化现象，高考制度亦然，如何借鉴千年科举的良性运行经验以破解现代高考改革的诸多瓶颈（公平与效率、考知与考能、全国统考与自主招考），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文化命题，也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历史难题，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面对浩如烟海的科举文献（史料、史迹、史事、史人），如何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对于研究者和研究方法而言都是巨大挑战，这就启示我们要从千年科举良性运行的指导哲学中去寻求破解的智慧。

哲学是从希腊字“Φιλοσοφία”（philosophia，由philos和sophia两部分构成的动宾词组，philos是动词，指爱或追求，sophia指智慧）转变而来，意为“爱

好智慧”或“智慧的朋友”，传统上包纳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学等领域，这些学科试图回答世界起源、知识获得，以及善恶美丑等理念问题。学术话语内的哲学，是指对人的生活看法和基本原则的理性根据的质疑、反思，并试图对这些看法和基本原则进行理性的重建。作为一种智慧的哲学，一般认为中国哲学起源于春秋时期，以孔子的儒家、老子的道家、墨子的墨家及韩非的法家等为代表。而实际上在之前的《易经》当中，已经开始讨论哲学问题。由此而言，哲学的“形名”来源于西方，哲学的“实在”之根在中国。中国哲学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影响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比如统治阶层信仰的儒教、道教、法家不但成为统治者依赖的哲学思想，也成为封建社会文化轴心的科举的指导思想，科举考试之内容来源于儒教，科考之形式让渡于儒家礼仪，科举的严法峻令来自法家，科举主考官则道、法、儒杂之。

科举观是人们对科举的基本看法和主要观点，哲学视野的科举观是指导科举研究和新科举学学科建设的指南，而科举哲学是一门运用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加速科举研究的理论化、系统化的专门学问。正因为科举得到了中国远古哲学的指导，并且其内容成为儒家哲学的具体体现，因此，从科举诞生那一刻起，就处于哲学的指导之下，而这种指导科举的哲学属于中国的哲学，而研究这一指导过程及其作用机制的过程即科举哲学，具体包括：有关科举存在的问题、有关人们如何认识科举的问题和科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科举哲学是新科学学的形而上学、知识论和伦理视界，它统领新科举学的研究范畴、知识领域和分支学科，它属于科举理论的元研究，是人们了解、认识和反思科举的最高工具和最有效武器，是指导人们从政治的、社会的、教育的、法律的、文化的、政策的、人才的、管理的、地理的和军事的等诸视角来认识科举的本质、功能、规律及其道德与实践的观念。新科举学研究应有科学哲学的指导，才更有可能接近科举的本质，才更有可能发现科举的价值。这样的科举研究，才是“实在的科举研究”。科举哲学是与时俱进的考试哲学，通过“宏大叙事”的手法探析科

举的哲学意蕴与哲学之于科举的重大价值，通过科举哲学的视野内条分缕析与视野外纵横捭阖来确立整个科举研究领域的指导思想，既是对古代科举优秀思想和现代科举研究关于考选公平论述的重要继承，更是在考试研究领域学习领会、贯彻践行科学发展观对21世纪高考等国家级大规模考试改革与发展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

一 科举的哲学基础

科举哲学不仅指导古代科举的改革和发展方向，也指导现代科举研究的重点和学科指向。众所周知，科举诞生于中国，其诞生时，中国上古哲学已经有一个半世纪的发展史，中国古代哲学亦有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史。因此，即使从东周之春秋战国时代形成比较系统的中国古代哲学开始，至秦始皇“焚书坑儒”欲速冻古文经学止，中国哲学已发展300年有余；再到汉初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被丞相卫绾采纳、被汉武帝刘彻钦定为皇家哲学后，到隋炀帝大业元年创立科举，作为汉代中兴指导思想的儒家哲学已发展了700多年，取代道家哲学成为封建社会统治阶层的最高指导哲学，独尊儒术的积极效应是维系了封建社会2000余年的有序统治，其消极效应是使儒家哲学“一家独大”而“百家争鸣”结束，其他思想和哲学流派受到抑制甚至被扼杀而类自然性淘汰。其实，“罢百家、兴太学、重选举”的指导哲学就是儒教，刘彻统治的54年间，所任命的13位丞相，多为精通儒学之智者，比如第二任窦婴、第四任田蚡皆推崇儒术，第六任公孙弘更是治《春秋》的大家，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藏均善《诗经》。自然风行汉代的诏举、察举、孝廉、贤良方正等人才选拔制度，亦多以儒家哲学为指导，其中，明经科所选即为“通晓经学、明于儒术”者，“儒者试经学”也顺理成为广义科举——始于西汉的贤良方正诏举——的应然之义（理），及至进士科产生，统治阶层推崇的儒家哲学自然就成为科举的指导思想和核心内容。

儒家哲学既为科举的哲学基础，其表现有三：其一，科举的文化皆以